

蔣彝


教授遺著

重訪中國

殷志鵬

廖慈節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蔣彝 教授遺著

重訪中國

殷志鵬 廖慈節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八〇年·香港

晨霧茫茫
競上工



書 名 重訪中國

作 者 蔣彝

譯 者 殷志鵬 廖慈節

責任編輯 鄭民

裝幀設計 尹文

封面題字 黃苗子

出版發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ong Kong Branch)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 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1980年6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港幣十二元

ISBN 962·04·0063·1

詩文書畫融於一書(代序)

殷志鵬

紐約諾頓出版社於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將啞行者蔣彝先生的《重訪祖國》^①推出問世。但是，非常不幸的，蔣彝先生却在同年十月十七日病逝於北京。這也就是說，蔣彝先生沒有趕上本書出版，就撒手西歸了！真是遺憾得很！！

爲了紀念我們的友情，我特地向該社函購一冊。書寄到時，我連夜展卷細讀，發現其中有一些過去從未提及或提及而不詳盡的事情，值得撰文向讀者略作介紹。這便是本文寫作的動機。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本書的彩色封面畫。

它是一幅人物、山水的混合畫。

畫中的人物，正是已故的新中國開國領袖毛澤東主席。他，穿着藍色人民裝、白襪和灰鞋，端坐在蒼松之側、白石之上。呈現在他眼前的，是層疊的山峯和奔流的河水。面對着這樣的人物和山水，有誰的心思不被吸引住呢！？

蔣彝先生引用了毛主席詞句“江山如此多嬌”題畫，也是煞費苦心的。

此外，全書還有琳琅滿目、美不勝收的大小插圖八十四幅。它們包括了各地的名勝，如北京的故宮、西安的大雁塔、南京的中山陵、江西的廬山和井岡山、桂林陽朔的山水等，以及人民的生活面貌，如北京牙雕工人、雲崗煤礦工人、大同驢車、揚州手推車、景

① CHINA REVISITED, 現譯爲《重訪中國》——編者按

德鎮盜工、鄱陽湖上的漁船等。啞行者生前一定相信：他的書中插圖足能挑起海外華人懷念中國的深情吧！

其次，我發現蔣彝先生在書中有意無意地描述自己。例如，他在“開場白”（Prologue）中就自稱是個“生在中國的中國人”。這稱呼在全書中出現過許多次。可知，作者並未因加入美籍而改變自己是個“中國人”。當然在法律上講，這是說不過去的，因為新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但在文化和心理上講，蔣彝先生的說法，代表着大多數美籍華人的態度。

在一九三三年前，也就是蔣彝先生未離開中國前，由於要“造福人民”、“急於興革”，他就在當“父母官”的任期內^①，想了很多新方法，例如：空中照相，測量土地，重定賦稅，以示公允等。別人稱他為“超時代的年青人”，或“瘋狂的年青人”，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可知，蔣彝先生在青年時期就已經與眾不同了！

蔣彝先生到了英國之後，才做了“啞行者”。

據說：當他的啞行者處女作《英國湖濱畫記》完稿時，出版商曾反對他用“啞行者”的筆名出版。原因是：可能會招致英國安全局即蘇格蘭場（Scotland Yard）的調查。

“爲什麼一個中國佬在英國旅行，要裝聾作啞呢！？”

蔣彝先生當時笑着對這位出版商說：“這樣可以增加銷路嘛！”

對於一個“初出茅廬”的作者來說，這種“出奇制勝”的策略，是有着實際的需要哩。

果然，蔣彝先生的話應驗了。該書在出版後一月，即全部售罄。出版商立即要求再版。而“啞行者”的著作生涯，也就從此展開。

蔣彝先生在書中自稱是第一個畫熊貓的中國畫家。另一位畫熊貓的著名畫家是吳作人。

一九三八年，倫敦動物園來了一位“中國客人”——大熊貓。

① 蔣彝先生在未離開中國前，曾做過安徽蕪湖、當塗和江西九江縣長，故有“父母官”之稱。

這位“東方貴賓”的駕臨，引起了英國人濃厚的興趣。蔣彝先生覺得此機不可失，立即要求園主允許他夜間入園觀察和作畫。結果，他出版了一本著名的兒童讀物——《金寶和大熊貓》。

爲了證明他自己是一個“異乎尋常”的人，蔣彝先生特別在路過揚州時作了一首詞。詞曰：

瘦西湖，
五亭橋，
幾經八怪弄風騷！
添一怪，
江州老，
自力今朝；
來看農工盡勤勞。

這大概就是他的“江州一怪”雅號的出處吧！

當然，蔣彝先生也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當他抵達南昌家中，看到了分別四十二年的老伴時，眼濕腿軟，幾乎失去控制。這種真情的流露，一定會在讀者心中產生“震盪”的！

蔣彝先生的遺著，雖然着重在藝術的表現和個人見聞的記載，但在字裏行間也處處流露出政治的氣息。例如他說：“過去歷朝各代都有名儒參政，但往往都是些因循守舊、食古不化之輩。他們既不欲改革土地政策，以利農民的經濟生活；又不願教育羣衆，令其關心國家大事。這就是過去中國積弱的根本原因。”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論！

蔣彝先生又以親身的經歷，揭露了國民黨政權失敗的真象。他直率地寫出：“國民政府的失敗，在於它從不關心人民。它不但不促進人民的幸福，反而處處加深他們的痛苦！”“人民知道共產黨軍隊是爲人民打仗，所以就全心全意地支持共產黨；可是國民黨的軍隊一出現，人民就爭相逃命！”

他認為蔣介石帶着殘兵敗將逃亡到台灣去，是“失去民心”的最佳證明。

蔣彝先生對於西方的“中國通”，也有很多微辭。他說：西方學者近年來出版了許多有關中國的書籍。可惜的是，絕大多數都是“隔靴搔癢，不明真象”。

在西方學界“混”了十六年的我，覺得啞行者此話並不過分！

總起來說，蔣彝先生的這本遺著，具有三種特點：

第一，蔣彝先生發揮了個人特有的才華，將詩、文、書、畫四藝融於一書，以期能達到令讀者一面欣賞書畫一面品味詩文的目的。

第二，蔣彝先生概括地自述一生在中國和國外奮鬥的歷程，使讀者了解到上一代為追求理想而付出的代價。

第三，蔣彝先生在書中表現出強烈的“愛國愛民”、“伸張正義，抵禦強權”的政治意識，頗能使人發生共鳴。

我認為讀者閱讀此書時，如能體會到上述三點，也就無負蔣彝先生撰寫本書的初衷了！

目 錄

詩文書畫融於一書（代序）

開場白	1
一、我爲什麼離開中國	3
二、我在英國的奮鬥	24
三、我在美國奮鬥的過程	40
四、終於啓程回祖國	49
五、在北京和華北的見聞	52
六、大寨、鄭州行	91
七、江南行	103
八、還鄉記	117
九、登廬山與井岡山	133
十、桂林、陽朔之遊	151
十一、重訪祖國的觀感	162
結束語	176
譯後記	181
譯者簡介	185

開場白

一九三三年，我被迫離開祖國。因為經濟不寬裕，又因為家人變故頻傳，使我內心深感不安，所以我當時只打算在海外居留一年左右。但是，一九三七年七月，日軍大舉侵華，中日全面戰爭爆發。而在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後，美國立即參加了反納粹主義和反法西斯主義的偉大戰爭；中國亦一變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家的一個伙伴。雖然我從一九三七年開始，就渴望着回國，但那時却無法成行。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但是，中國境內的戰爭並未停止，因為內部的鬥爭又起，並在全國劇烈地展開。這樣，我就更無法回家了！此時，我經友人推薦，在紐約獲一教職。那正是麥卡錫主義興起的時候。這個壓服“非美活動”的運動，正深入美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即使我在別人面前公開表示回國的願望，亦不可能。但是，一九七〇年代開始，情形有了轉變。美國尼克松總統到了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在聯合國取得了全權的席位。中美關係開始緩和。較多的中國新聞出現在每日的報紙裏，而這些新聞的性質，和一九四九年前的報道情形，是迥然不同的。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中國，是一個非常分裂的國家。大多數的中國人民，無一刻之和平。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很少東西吃；很多人因此而餓死。

誰不想利用這個中美關係解凍的機會去看看中國，尤其是像我這樣一個在匆忙中離國、而家中又留有四個小兒女的中國人呢？一九七一年，我從哥倫比亞大學退休時，很多人正啓程去中國。但我却不能立刻仿效他們，因為我受聘去香港教學六個月，接着又去澳

洲教書一年（一九七二至七三）。

我離開中國已經四十二年，將近半個世紀。半個世紀是一個很長的時間！在這四十二年中，我看到英國和美國發生了許多的變化。但自一九三三年以來，中國發生的變化則更大。我渴望地與好奇地想知道這些巨大的變化。因此，我在報紙上，以及在最近訪華歸來的人所寫的書裏，盡量地去閱讀所有能夠讀到的東西。但是，有句中國俗話：“百聞不如一見。”此語促使我決定親自回國去看看各種的變化。終於，一個機會來了。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五日，我經香港，飛廣州，在中國居留了兩個月。我的兩個女兒和女婿，陪同我遊覽了一些地方。在這整整的六十天當中，我記下了我個人的感受和看到的各種景物，以及我和家人討論的事情。這些事物，就是構成本書的主體，也就是我個人在一九三三年前和四十二年後親身體驗的記錄。

這兩個時期中國歷史的對照，是非常清楚的。我並沒有誇大其詞，也沒有敘述任何我未曾看見的事情。有些地方，我可能因受篇幅限制，無法詳述，而無可避免地予以概括性地說明。雖然我親身體驗到的變化，很可能和他人所寫的不盡相同，但我必須告訴讀者：我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中國人，曾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年。還有，我的兩個女兒和女婿（都是高中教員），以及她們的七個小孩，都一直地在中國生活。他們一定會給我一些較為深入的認識和解釋。根據我自己的判斷：我已盡可能地忠於我所寫的了。

我所記載的事物，到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為止。但我相信：中國將來的變化，是愈變愈好，而非愈變愈糟。過去，中國被稱為是一個落後的國家。現在，中國經過了二十六年的努力，已經成爲一個嶄新的國家。它的八億人民，正在一條心地做着各種建國的工作。

一、我爲什麼離開中國

自從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在以後的一系列戰爭中被其他西方列強和在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中被日本打敗之後，極大多數的中國人都知道：他們的國家有很多東西需要向外國學習。可是，目光短視的滿清統治者，深怕輸入外國觀念，會削弱他們的統治權，因此不鼓勵年青人去西方國家或日本留學。後來，中國又在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事件中，被包括美國在內的八個西方盟國（譯按：東方的日本亦是其中之一）的聯軍打敗。在戰後簽訂的條約裏，有一條規定：中國政府必須向每一參戰國家，付出巨額的賠款。中國除了簽訂許多不平等條約之外，還要開放一些港口。西方列強可以在港口的“租界”裏，行使治外法權。不但如此，它們還經過所謂“協議”，派出專人主管中國的郵務和港務。根據我的記憶，這些主管人員都是英國人，因爲英國政府深怕中國政府付不起賠款。

美國雖然沒有接受這項賠款，但它也拿這筆錢在北京設立了一所清華學校，專事訓練十四歲左右的中國青年，然後再把他們送到美國接受高等教育。從一九一二年以後，數以百千計的中國青年學生去美國大專院校深造。一般而言，這些在美國學成而後返國的人，都有較多的機會獲得較好的職位。除了清華的學生之外，很多富家子弟亦紛赴國外留學。那時，留學變成了一件時髦的事情。但是，除非一個年青人能夠考取公費，只有有錢人家才能負擔得起留學的費用。我像很多其他大學畢業生一樣，也參加了報考公費獎學金的人羣，但因英文不夠水準而落選。我提起這件事，是爲了解釋我後來在三十歲時，才去英國，那是爲了一個不同的理由。

我生在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後的幾年——一九〇三年。在那次

中日戰爭中，中國慘敗，除了遭受到很多損失之外，並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在我十歲前，家裏是不許我一個人出門的。但在家裏，我過的就像我曾在了一本早期的書《一個中國人的童年》裏記述的那樣，大部份的生活是十分快活的。我五歲時，母親死了；十八歲時，父親又死了。我是祖母加上姐姐的協助養大的。在十多歲時，我在家塾裏受了很好的教導，學了很多東西。後來，我又上了三年中學（相當於美國的高中），讀到關於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中日戰爭、義和團事件和孫中山先生反清運動的歷史教科書。我的姐姐爲了取悅她的未婚夫婿，進入一間教會學校，家裏就開始聽到一些有關基督的教義。這些教義使得我的年青的頭腦不停地想：爲什麼怕上帝的英國人，以及美國人，會強售鴉片毒品，給我們中國人食用，而無懼於上帝的懲罰呢？他們是不是忘記了“愛鄰如己”的聖經之言？這可能就是我爲什麼沒有變成基督徒的最主要的理由。

我的祖母是一個仁慈的、通情達理的和心存公正的人；她根據中國的老傳統管理家務。儘管中國和外國有很多的麻煩，以及中國人民中間存在着不安，但我的家裏的氣氛還是相當的安定。我祖父的一生，雖然在滿清統治下度過，但從未在心裏支持過滿清政府。他堅持地穿着過去明朝的服裝，因爲明朝是由漢族統治的。但是清朝的文字獄是非常厲害的；很多學者因爲寫了一些批評清朝皇帝的文字而被判死刑。沒有一個人敢和當權者表示異議。我的祖父幸能終身安然地保持着他的反清的想法。

清朝的第一個皇帝，是一個強人。他率領着訓練有素的滿洲軍隊，於一六四四年，擊敗了明朝的末代弱君，進入中原，建立了一個新朝代——清朝。那時的滿洲軍隊，勝利不久，都是上乘的戰士。他們和皇家都屬於同一個民族的後裔，享有超過中國境內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特殊待遇。但他們的後代却變得富有而柔弱。到了十九世紀初年，極少數的滿洲人仍當下級軍人；相反的，他們之中有很多人雖然缺乏作戰的經驗，但却能躍升到將軍和元帥的職位。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缺點，而又對外人保持着一種傲慢自大的態度。

就在鴉片戰爭爆發的前夕，一份《我們雖不輕敵，但對他們亦無足畏》的備忘錄，送到了皇帝的面前。不久，“薄蛋殼”旋即被英軍的槍炮擊碎了；“蛋白”與“蛋黃”再也無法合在一起！自那時起，敗仗接踵而來。在被西方列強和日本打敗了許多次之後，清朝的皇帝和大臣們才決定設立一個學校，訓練新軍的領袖。第一個這樣的學校，便是“北洋軍事學堂”。

滿清的統治者被推翻之後，中國於一九一一年成立了一個共和國，但是中國的災難並未終止。孫中山先生——反清的革命領袖和中華民國的締造者——被選為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但是，不幸的，他沒有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來支持他的新政府。他必須要向當時最有勢力的袁世凱讓步。袁世凱並不是滿族，而是一個生在河南省的漢人。他曾經做過直隸總督，但後來因與上司發生意見而下野。他也做過“北洋軍事學堂”的校長。後來，他受命代表滿清皇室，和孫中山先生率領的革命勢力和談。袁世凱非常狡猾。他立刻改變立場，就在前政府軍隊——當時幾乎全是漢人，只有很少數是滿洲人——的支持下，被選為中華民國總統，繼承了孫中山先生的職位。

袁世凱從未對共和國有所了解。但他對過去的宮廷生活，却是非常地清楚，故而想秘密地計劃稱帝。他獲得了過去曾在北洋軍校做過學生、在他手下受過訓練、並和他友好的省長的支持。他用“洪憲”的年號，做了皇帝。但是，在中國西南各省的孫中山先生的追隨者，起來反對他，結果他只做了八十天的所謂“皇帝”。

雖然袁世凱被推翻了，不久也死了，以及中國又變成了一個共和國，可是孫先生並未恢復他原有的職位。曾在袁世凱當政時被選為副總統的黎元洪，現在繼任總統；他派段祺瑞做國務總理。黎、段二人，加上一部份其他的省長在內，均為北洋系軍人。因此，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八年，中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在軍人手中。他們都被稱做“軍閥”。

那時，“軍閥”一詞，在中國的字典裏，是一個新名詞。每一個將領都擁有大量的軍隊；這些軍隊，不忠於國家，只忠於這個將



老農搬石圖

領本人。假如這個將領是一個省長，他可以徵收地稅，做爲軍餉，而軍隊則爲他做任何的事情，因爲“法律”也在他的手中。因此，他就被稱爲該省的“軍閥”。“軍閥主義”一詞，是用來形容他們的行爲。“軍閥主義”有時與“封建主義”同義；但是，軍閥比封建王侯還要壞，因爲他們通常都是文盲和作惡多端的人。他們從未想過要爲人民做些什麼，只想盡量地對他們加以壓榨。當中國人民慘遭水、旱、饑饉災害之時，這些軍閥不但不幫助人民，反而更加深他們的痛苦！可是，每一個軍閥都僱有許多所謂“孔門學者”的舊式文人，爲其效勞。但是中國人民，甚至於一個普通的中國人，都恥於叫出這些文人的“姓名”！

從歷史上看，在過去的許多世紀裏，中國的兵都不是徵來的。中國有句俗話：“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但是，爲什麼這些軍閥從不缺少兵呢？道理很簡單。很多人爲了避免饑餓而當兵。美國作家懷特（Theodore H. White）曾經這樣寫過：“饑饉和水災，是中國的悲哀！從很早以前開始，中國的史籍就以動人的、廣續的、註定的口吻，記下了這些反覆不斷發生的災患。”根據一個“美國農科學生組織”的研究，我們知道了一個驚人的、明顯的事實，那就是在公元前一〇八年到公元一九一一年之間，中國一共發生了一千八百二十八次的饑荒。易言之，幾乎每年就在一省或另一省發生一次饑荒。很多人爲了吃飯和活命而參軍。中國有個代替“兵”

的名詞，叫做“吃餉的”，或“吃糧的”。同樣的，早期的中國基督徒，爲了跟着教會吃飯而入教，就叫做“吃教的”。“吃糧的”兵，是了解保衛國家的意義的；他們只服從給他們飯吃的任何人。他們從未想過要當“國防軍”。由此可以了解：爲什麼中國屢戰屢敗？顯然的，滿清的統治階層從未厘訂過一個徵兵制度，訓練全國的年青男子，來保衛國家。我讀過我家的家譜，大約從公元前第三世紀的西漢到我這一代，家裏從來沒有一個人被徵去當兵。

現在，讓我再回到袁世凱被選爲共和國的總統和快要恢復帝制的時候。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狡猾的日本爲了奪取德國在中國膠州灣和山東鐵路的權益，而加入了同盟國。接着，它更進一步地突然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乘着西方列強在歐洲熱戰無暇東顧之際，秘密地將“二十一條”交給了當時的中國政府元首袁世凱。這些日本的要求，極端地困擾着袁世凱，因爲它們將使中國變成日本的附庸國。但是，他的機警，使得日本的陰謀，在他五十六歲逝世之前，無法得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進行到第三年時，美國政府與德國斷絕了外交關係，並邀請包括中國在內的中立國家和德國斷交。此舉在中國內部引起了很大的爭論，因爲那時的中國政府由許多軍閥掌權。但中國最後還是在名義上加入了同盟國，就是沒有派兵參加作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凡爾賽和平會議的決定，並未反對日本的各項要求，亦未同意中國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在這時候，日本仍然向中國施予壓力，要它接受“二十一條”。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一次巨大的、從北京大學開始的羣衆示威，在北京發生了。雖然統治的軍閥們，爲了壓制示威者，而亂殺學生和教授，但這次的“五四運動”，很快地從北京蔓延到全國。在我出生地的九江，亦無例外。我和許多九江市的中學生，在反對日本無理要求和西方列強在凡爾賽的不平的悲憤之下，高舉着抗議的旗幟，天天參加羣衆示威運動。

這次的“五四運動”，可以說是第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捩點。它也是中國的第一次“文化革命”。因爲它不僅激起了中

國人民認識他們的將來，並且亦使年青人的思想和文化轉向一個新的目標發展。在那個時候，古文式的寫作，被改變成口語式，使得非常易讀和易解。這兩種中文寫作方式的不同，就如同英國喬賽（Chaucer）時代的英文和現代美國報紙的英文一樣的大。

當我於一九二二年離家去南京國立東南大學入學時，該校掀起了一個“只有科學，能救中國”的運動，鼓勵所有的年青人研究科學。當時大家都覺得：如果中國人民有足夠的科學知識，懂得製造軍器和機器，那麼近代中國的病根，就可以消除了。我和其他的大學新生一樣，選擇了化學系，希望將來能在“救中國”方面做些事情。在那些日子裏，中國的一些理科教授，幾乎大部份都曾在美國和英國受過教育。但是，不幸的，大多數大學的理學院，都缺乏現代設備的實驗室。張子高教授（我在一九七五年五月見到他；他那時已達九十一歲高齡）要我學無機化學和物理化學。四年後，我拿到了科學士的學位。由於那時沒有機會在國內繼續從事化學方面的高深研究，我就試圖報考公費留學，但是失敗了！

一九二四年，江蘇省的軍閥省長齊燮元，以南京為中心，發動了一次可怕的戰爭，攻擊鄰省——浙江省——的軍閥省長盧永祥。他們每人都視所轄省區為私產，並欲欺壓他省，而對北京的所謂“中央政府”的命令，全不理睬。我們在南京的大學，被迫關閉，全部學生停學一期。我利用這個機會到了廣州，與家兄大川相聚；那時，他是江西督軍李烈鈞的秘書長。

那時，中國在北京的所謂“中央政府”，是在軍閥的手中。雖然它是外國政府所承認的中國的合法政府，但它只能在有限的地區內行使職權。曾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先生，在廣州成立了一個軍政府，控制了西南五省，與北京的“中央政府”對抗。當時，江西雖未包括在內，但過去強人江西督軍李烈鈞帶着他的軍隊到廣州支持孫先生。湖南督軍譚延闓和其他許多要人，當時也在廣州。由於孫先生認識到早期的失敗，是缺乏一支強大的軍隊，所以就在黃埔設立了一個軍校，聘任剛自日本軍校訓練回國的蔣介

石做校長。由於黃埔軍校是一個嶄新的軍校，它在廣州掀起了一種新的風氣；很多年青人爭相報名入學。家兄的一些朋友，也勸我參加軍校，不要再回南京繼續讀大學。但是，家兄同意了我的意見——不要浪費了三年的大學課程。可是，江浙的內戰仍在南京附近進行着；我一時仍不能回去。

這時，我的一位朋友在海南島開辦了一個暑期學校，邀我去幫忙。我毫不考慮地就去了，因我從不放棄旅行的機會。我乘船到了海口港——瓊山。住在很遠的領事館的朋友們來接我。海南島在中國歷史上，從漢朝開始，就是中國最南端的土地。著名的詩人、政治家蘇東坡，曾在這裏流放多年。海南島是一個面積相當大的海島；它離開中國大陸約有三十哩，一向受在廣州的廣東省政府管轄，但它本身却通常由一位軍人主理政事。第一次大戰前，法人企圖將它與法國殖民地安南合併，因它接近海防的緣故。但是，英人認為它在中國南部的英國勢力範圍之內，堅不同意。結果，海南島還是中國的領土。

海南島有很多的少數民族。我看到一些臉上、臂上和身上刺着花紋的當地人，就像我在非洲和新幾內亞見過的人一樣。島的中部，有一座很大的山，叫做“五指山”。大多數的本地人，都住在這裏。只有很少的漢人，到過那裏。我試着在我居留的幾個月裏，研究島上的一般情況、自然資源和物產分佈的情形。回到南京以後，我寫了一篇長文，登在一九二四年上海有名的《東方雜誌》上。我對這篇“處女作”，一直到今天都覺得很高興！

我家的經濟情況，跟着全國的經濟惡化而變壞。從日本和其他國家進口的便宜貨，扼殺了本地出產的商品；每日的物價跟着飛漲。在我祖母過世之後，叔嬸治家不當，又兼不公，因此我無法自費留學。當時，我只拿了一個科學士學位和只懂得一些初級的科學知識，除了教書之外，別無他事可做。於是，我就當上了江蘇省北部海州第十一中學的教員。

海州與山東省接壤，靠近中國東部的海岸。渤海和黃海就在附